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1953-2003

文学研究所 学术文选

WENXUE YAN
JIUSUO XUESHU
WENXUAN

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1953-2003

文学研究所 学术文选

WENXUE YAN
JIUSUO XUESHU
WENXUAN

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杨 义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信	王善忠	邓绍基	刘扬忠
朱 寨	何文轩	杜书瀛	杨 义
杨匡汉	张 炯	赵 园	钱中文
徐公持	党圣元	钱 竞	樊 骏

秘书长 严 平

目 录

1987

1987 年

- 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 沈玉成 (1)
- 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 林 非 (26)
- 论何其芳早期散文的艺术贡献
- 《画梦录》、《刻意集》试析 陈尚哲 (41)
- 文学广角中的一个世界
- 新时期女性文学论纲 陈素琰 (60)
-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和讨论 吕 林 (73)
- 论文艺的本质及其探讨原则 张国民 (84)
- 文学研究格局与新学科建设 程 麻 (104)

1988 年

- 戏剧叙述观念的流变与拓展 高鸣鸾 (117)
- 关于台湾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彭韵倩 (130)
-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重点 严昭柱 (148)
- 《录鬼簿》的历史地位
- 兼论元人戏剧观 吕薇芬 (171)

1989 年

- 关于现实主义的若干思索 洁 泯 (195)
- 凌叔华:角隅中的女性世界 孟 悦 (209)
- 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
——兼论作家灵智活动的物化形式及其
文化意义 董乃斌 (227)
- 《金瓶梅》和李开先十六事 吴晓铃 (249)
- 文格与人格
——邵燕祥杂文论片 何西来 (265)
- 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 王学泰 (279)

1990 年

- 论王沂孙词的意象形态和心态特征 王筱芸 (301)
- 读《洗澡》 孙 歌 (333)
- 论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色 陆永品 (351)

1991 年

- 论人类活动的基本类型
——为审美—艺术活动定位 杜书瀛 (373)
- 美的观念论 蔡 仪 (392)
- 《坎曼尔诗笺》辨伪 杨 镰 (427)
- 梁启超对晚清文学革命的作用及影响 连燕堂 (447)
- 美学的逻辑问题 杨汉池 (464)
- 南天一隅,重峦叠翠,万壑争流的散文风
景线
——《八十年代台湾散文选》代序 楼肇明 (485)
- 中国当代海峡两岸“文化小说”比较 王淑秧 (505)

1992 年

-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春秋观 陈燕谷 (521)
- 论竟陵八友 刘跃进 (547)
- 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及其在晚清繁盛的
原因 王俊年 (564)
- 稼轩词与老杜诗 刘扬忠 (585)
- 缺失的悲歌与难鸣的梦魇
——台湾当代同性恋文学论 安兴本 (603)

1993 年

- 成圣之道
——清初孙奇逢理学思想述评 靳大成 (617)
- 传统小说和传统风格 李洁非 (647)
- 后稷神话探源 李少雍 (660)

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

沈玉成

晋、宋之间，出现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位大诗人。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和作品风格都有很大不同，成就也不能齐足比肩，但后代的诗人却常把他们并称“陶谢”，比如杜甫的“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王安石的“未怕元刘妨独步，每思陶谢与同游”（《示俞秀老》）、陆游的“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读陶诗》）。这种情形说明了陶、谢在不同之中又存在某种共同。主要的一点，应当是在晋、宋间“诗运转关”之中，有着两位诗人的共同努力。这一“转关”在内容上的标志是五言诗挣脱玄理的束缚而走向田园山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形式上的标志是由平典枯槁到声色大开，“菱荷迭映蔚”、“空水芒澄鲜”。^[1]这里借用陶、谢的诗句，不过是把问题描述得形象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各得一偏。正好相反，无论在“转关”的内容或形式上，两位诗人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

历来的研究者，于陶渊明都无闲言，但对谢灵运则毁誉不一，其所毁所誉，又颇有不尽妥当之处。本文仅试图对有关谢灵运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一、晋、宋易代之际的谢氏家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远较隋唐以后为密切。高门世族垄断经济、政治，也垄断文化，政治形势的动荡总会牵连到文人。鲁迅所说《文选》中的作家有一半不得好死，从嵇康、陆机、潘岳一直到谢灵运、鲍照、王融、谢朓，莫不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势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特别在谢灵运身上，这种文学和政治的纠葛表现得尤其突出而自觉。因此，弄清谢氏家族在东晋后期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和作用，对研究谢灵运的思想和作品来说，并非庸俗的社会学方法或者肤泛的题外文章。

东晋的高门素推王谢，然而陈郡谢氏的得以跻于甲族而且居于冠冕，却大大晚于琅琊王氏而要谢安执政以后。《世说新语·简傲》记载过一段很生动的故事：

谢公（安）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耳！”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省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恬小字螭虎）不足耳！”

谢万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除了清谈和写文章，于世事茫无所知。王恬是王导的次子，其所以不礼谢万，自然不是由于谢万的人品不足取，而是认为两家的门第不能相埒，近似于王僧达的慢待路琼之，张敷的轻视秋当。^[2]谢安明白这一点，所以不去讨这个没趣。同篇又记“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是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宋书·荀伯子传》记“伯子

常自矜荫籍之美，谓（王）弘曰：‘天下膏粱，惟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谢万当众“索便器”，不仅是当时的所谓通脱，而且也在显示高门的骄矜，阮裕的讥评，正是颇为刻薄的针锋相对。笃，意即老实过了头而不通世务，^[3]言下之意就是有点小家子气，缺乏教养。荀伯子是谢晦的姐夫，他引王弘为同类而看不起谢晦。阮、荀两家均为老牌的大姓，谢氏虽然一门显贵，在他们的心目中，多少还有暴发户的味道，所以在嫉妒之外又高自标榜而不屑与之同列。

然而谢氏虽然后起，上升的趋势却方兴未艾。晋孝武帝宁康元年，桓温病死，谢安继而当国，成为王导、庾氏兄弟以后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谢安的治国方针主要有两条：在政治上“镇之以和静”，即保护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竭力调和这个阶层内部的各种矛盾；在军事上，建立一支由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部队，即北府兵。

北府即京口（今江苏镇江），聚居着当时南徐州、南兖州的侨户，“人多劲悍”。桓温生前，就说过“京口酒可饮，兵可用”的话（《晋书·郗超传》），有意招募士卒，编为军队，但没有成为现实。太元二年（377），谢安的侄子谢玄奉命组建新军，加以训练，号为北府兵。北府兵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太元八年淝水一战，以寡敌众，击退了苻秦的百万大军，使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相对稳定。

东晋的军事重镇是荆州，其力量足以扼制扬州，也就是建康一带的长江下游。大军阀王敦、陶侃、庾亮、桓温父子，都是以荆州为根据进而控制中央甚或公然叛逆。世家大族希望维护司马氏的中央政权——门阀联合政权，而军阀则意在削弱或取代司马氏政权。这种门阀与军阀的矛盾是东晋南渡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主要形式。北府兵的成立使门阀的力量得以加强，但是它自身发展的结果又出现新的军阀，后期的主要将领刘裕就是凭借这

支武装成为宋武帝，而且在夺权斗争中十分沉重地打击了谢氏家族。

桓玄起兵叛晋，收买了北府兵的将领刘牢之，攻入建康。当时地位不高的刘裕联络一部分北府军的将领又推翻了桓玄。到晋安帝义熙以后，刘裕的力量日益壮大，渐成代晋之势。面对这一严重的政治局面，门阀内部出现了拥护刘裕和反对刘裕的两派力量。大体上说，王氏家族拥护刘裕，谢氏家族不像王氏那么一致，谢晦、谢景仁、谢该依附刘裕，谢混、谢纯、谢灵运则反对刘裕。

谢灵运的族叔谢混，是谢氏家庭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晋孝武帝的女婿，史称“风华为江左第一”（《南史·谢晦传》），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称其“仍世宰相，一门两封”（卷三十五《谢弘微传》条），曾对谢灵运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当刘裕的羽翼渐丰，谢混一度入过刘裕幕府，虚与委蛇，^[4]实际上却支持刘裕的对立面、北府军的另一位将领刘毅，期望在二刘之间争夺的夹缝中延续司马氏政权，保护家庭的利益不受损害。比之于刘裕，刘毅的某些特点也确乎容易受到高门世族的赏识。刘毅和刘裕一样，颇有赌徒的性格，桓玄说他“家无儋石之储，携蒲一掷百万”，然而“爱才好士”（《晋书·殷仲文传》），“缙绅白面之士辐凑而归”（《南史·胡藩传》）。谢混企图利用刘毅，其用意是十分明白的。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的情况，史略不详，但从义熙四年刘毅推荐谢混任扬州刺史以此排斥刘裕入朝辅政一事来看，其间交通策划，显然极为密切，所以后来刘毅兵败，刘裕以晋安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历数刘毅的罪状，其中就有一段：

尚书左仆射谢混凭藉世资，超蒙殊遇，而轻佻躁脱，取为乱阶，扇动内外，连谋万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怀！（《晋书·刘毅传》）

所谓“扇动内外”，和后来谢灵运因为“构扇异同”而出为永嘉太守，都还不能算是凭空捏造的罪名，不过时势不同，叔侄之间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不能相提并论。

谢混是谢氏家族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在政界和文坛上都负有重望。有理由认为，谢灵运参加刘毅幕府而且追随不渝，应当是出于谢混的安排。然而谢氏家族中也有不少人反对谢混的政治态度。谢灵运的从弟谢晦就是刘裕集团的核心人物，谢混的从兄谢澹以“方外士”的眼光，也看出了谢混的做法潜伏着危机，《南史·谢晦传附谢澹传》载：

初，澹从弟混与刘毅昵，澹常以为忧，每谓弟璞、从子瞻曰：“益寿此性，终当破家。”混寻见诛，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祸。

谢氏家庭内部对二刘之间的不一致，反映了家族内部对政治力量的不同估计和对王朝鼎革的不同态度。自然，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之中，成员之间的不一致并不足怪，然而相对于王氏家族的基本一致来说，这种微妙的差别是值得玩味的。

魏晋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门阀专政的社会，寒门素族要进入统治集团，行伍军功是惟一的途径。这条途径艰苦而又危险，为习于逸乐的世族子弟所不屑一顾。^[5]由行伍而重将帅甚至帝王，这就在门阀之外另树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终东晋、南朝之世，多次重大的政治动荡都是由于门阀和军阀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形成的。正是由此，政治家谢安意识到武装力量对中央政权和本家族的重要，才让谢玄组建了北府兵。谢安的时代谢氏一门赫奕，谢奕、谢万、谢琰、谢玄、谢石，都曾先后手握重兵。《晋书·谢安传论》说：“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宸资之以端拱，凿并

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相形之下，王氏就显得逊色，所以谢混、谢灵运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要比王氏积极。反之，东晋后期，谢氏的军权虽然已被北府军的将帅所取代，但影响并不能低估。刘裕代晋自立，谢氏的重要人物能不能拥护捧场，其间关系举足轻重。^[6]所以，刘裕父子对谢门子弟的基本方针是优容争取，这一手行之无效，就继之以另一手即置之死地。在下面讨论谢灵运政治态度的时候，我们将进一步看到这种方针的具体运用。

二、“倔强新朝”

谢灵运的一生始终和政治风浪纠缠在一起，而且这种纠缠不是被迫卷入而是自动投入。他在政治上发轫之始，就站到了刘裕的对立面，这一错误的选择是谢灵运后半生悲剧命运的重要契机。

《宋书》本传记：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爱知之。袭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为琅玕王大司马行参军。……抚军将军刘毅镇始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

散骑侍郎品级不高，却属于清贵之官，所谓黄、散之职，“须人门兼美”（《陈书·蔡凝传》），不是甲族子弟，极难染指。谢灵运辞散骑侍郎不就，却愿意就任刘毅的幕僚，原因当不外乎两条。其一，本传这一段记载未书年月，但大体上可以推定。谢灵运袭爵在元兴元年，当时桓玄兴兵叛晋，入建康，辞官不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二，当时高门子弟多人入武人幕府，这反映了门阀

和军阀的矛盾中互相依赖的一面。记室参军类似于今天的秘书，有机会经常对主帅施加影响。谢灵运是谢混最赏识的侄子，在支持刘毅问题上叔侄之间的一致，也很可能并非出于偶然。^[7]

刘毅、谢混失败被杀，对谢氏家庭，特别谢灵运本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形格势禁，他最终只能跻身于刘氏朝臣的行列里，然而他又对刘裕父子采取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

刘裕起自下层，有很深的政治经验和人生阅历，十分理解和门阀世族之间的关系处理是否妥当，将有关于事业的成败。他在诛杀谢混、稳定了政治形势以后，立即转过来对谢家表示优容宽大，不但没有株连一人，而且改授谢灵运为太尉参军；宋文帝即位，杀了有拥戴之功的徐羨之、傅亮和智囊谢晦，又立即征召被徐、傅排挤的谢灵运入都，授为秘书监。刘裕父子这种一打一拉的策略不仅是一种姿态，目标也不仅止于谢灵运个人而是牵涉到整个谢氏家族。

按常理而论，新王朝的统治者对在政治上反对过他们的人如此优容，谢灵运即使不能感激涕零，肝脑涂地，至少也应该和光韬晦，维持表面上的融洽。但是谢灵运没有做到，或者说根本不肯这样做，原因又是什么呢？

历来的一种解释是谢灵运忠于晋室，所以和刘宋王朝格格不入。这是迂腐的见解，硬把南宋以后的忠君观念套到南朝人身上。当时人就不是那么看的。《南齐书·褚渊传论》：

自金、张世族，袁、杨鼎贵，委质服义，皆由汉氏，膏腴见重，事起于斯。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宣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

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贵宠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

《颜氏家训·文章》：

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
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

衡诸事实，萧子显、颜之推的议论都是深知内情的个中人语。魏晋南北朝的封建社会形态不同于隋唐以后，门阀统治是政权的基础和支柱，王朝更替迭代，而门第依然如故，人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和社会声誉更多地来自家族而非来自朝廷。同时，魏晋以来儒学统治受到冲击，也使忠君这一伦理观念不仅变得淡漠，而且发生动摇。在魏晋之际，君父先后成为辨析名教的一个论题，到晋代，孝的分量就超过了忠，而所谓君父、忠孝，当然就是王朝和家庭的代指。^[8]高门世族对改朝换代，往往只以家族甚至家庭的利益为依据来考虑自己的立场。上面所说王、谢两家对刘裕代晋所持态度的差别，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宋书·徐广传》载：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哀恸，哀动左右。及高祖受禅，恭帝逊位，广又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之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收泪答曰：“身与君不同。君佐命兴王，逢千载嘉运；身世荷晋德，实眷恋故主。”

追念旧朝而唏嘘哀恸，在上层集团中已经很不习惯了，否则谢晦就不会有这样的质问；徐广的回答，辞令堂皇而委婉，但细一推究，他用来作解释的并不是“忠君”的大原则，而是他和谢晦有利害的不同。再后，到萧衍代齐，颜见远不食而死。萧衍听到，

诧异说：“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梁书·文学·颜协传》）这就说得更露骨，改朝换代，士大夫仍然是士大夫，用不着搭上性命来维护什么道德教条。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伦理观念之中，认为谢灵运忠于晋室、对抗刘氏，因而最终被杀，显然是悖于情理的，而以谢灵运的行动和作品来作论据，也完全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比较合理的评论是张溥的话：

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如下
伍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
中情实乖。……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
族，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谢康
乐集》题辞）

张溥看到了谢灵运以门第自高，看不起新朝天子，这就接触到了事情的实质。谢灵运的门第观念是强烈的，试看这种口气：“于穆冠族，肇自有姜。峻极诞灵，伊源降祥。貽厥不已，历代流光”（《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9]“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述祖德》诗序），就可以知道张溥言之有据。然而问题又接踵而来，同样是高门冠冕，王氏家族的一些知名人士又何以能“低头执版”而毫无扞格呢？除了王、谢两家在东晋中叶以后权势的部分转移以外，还有一条理由不容忽视。

东晋的高门华胄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已如上述，但充其量不过是勾结利用，在内心则对武人极端鄙视：

（王）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

述大怒，遽排下，曰：“汝意痴邪！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晋书·王述传》）

（谢奕）与桓温善。温辟为安西司马，犹推布衣好。在温座，岸幘笑咏，无异常日。桓温曰：“我方外狂司马。”奕每饮酒，无复朝廷礼。尝逼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主曰：“君若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奕遂携酒就听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责。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众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众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诸君皆是劲卒。”

曾祖父谢奕，对“凤标令誉”、“勋绩冠时”的桓温，尚且视之如无物，谢灵运面对祖父谢玄亲手创建的北府兵中的“劲卒”、“老兵”，又将作何感想？门下的家兵卫士居然要做皇帝，自己行将俯首称臣，这种心理上的损伤较之其他高门甚至本家族其他支派的成员，无疑都要难于承受。义熙十二年，他奉使到彭城，对刘裕北伐姚泓表示慰问，并作有《撰征赋》。^[10]按照赋题，应当是一篇对刘裕歌功颂德的文章，但偏偏只有很少一部分写到刘裕的功业，比之为周公，内容的绝大部分是在怀古，赞美羊祜、谢安，感叹项羽、韩信，斥责吕布、王敦，如果说这种奇特的文不对题没有言外之意，那是不可理解的。

自然，谢灵运对刘宋王朝的不合作乃至抵制，出于顽强的门阀意识而不肯向“老兵”屈心降志是复杂的精神状态中最深层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刘裕和刘义隆并不可能真正信任这个反对过他们的门阀世族中的名士文豪，在表面的优礼下掩藏着深刻疑忌。瞧不起和不信任汇成了谢灵运悲剧命运的矛

盾焦点。矛盾的发展一度有所缓和，那就是和庐陵王义真情感异常的一段短时间。到徐羨之和傅亮的阴谋得遂，谢灵运外放永嘉，义真被杀，这一矛盾乃迅速激化，把谢灵运推上了不容转身的绝路。

需要解释的是被指为叛逆证据的四句诗和那一首临终诗：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龚胜无遗生，李业有穷尽。嵇叟理既迫，霍子命亦殒。
凄凄凌霜叶，炯炯冲风菌。邂逅竟无时，修短非所愆。恨我
君子志，不得岩上泯。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惟愿乘来
生，怨亲同心朕。

两首诗都见于《宋书》本传（后一首最后四名未录，据本集），但前一首的可靠性却大可怀疑。第一，它和谢灵运的思想和政治态度不相符合，甚至和整个南朝时代的思想潮流不相符合，理由已如上述。以秦比刘宋，拟于不伦，先不必说，“忠义”云云，更和他的热衷如风马牛。谢灵运在作品中几次提到鲁仲连，“仲连却秦军，临组乍不缬”（《述祖德》），“鲁连轻齐组”（《游赤石进帆海》），“鲁连谢千金”（《入东道路诗》），都是就“功成不居”这一角度着眼的，和鲁仲连声称秦国如果一统天下就要“蹈东海而死”这层意思毫不相干，这首诗忽然从鲁仲连的“忠义”生发，也令人感到突兀。^[11]第二，想把谋叛的罪名加于谢灵运，前后共三次，即前此的孟顗诬告、后屯的广州弃市和这一次在临川内史任上的被收。所谓谋叛，历来就没有人相信。本传载谢灵运在临川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云云，在感到自己被推上绝路，惊惶愤慨而丧失理智，采取螳臂挡车的